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63期

2011年12月2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变化无常的世界 无人称雄的时代

斯马加战略咨询公司总裁 克劳德·斯马加*

在未来几年里，欧洲都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高失业率、高负债率是逃不掉的，能有微不足道的增长就是最好的情况了。德国决心利用危机把柏林共识强加于欧元区，并且不顾实际情况，顽固坚持正统的经济理念，将起初能够被遏制和处置的希腊危机，变成通过连锁反应席卷整个欧洲、威胁欧元生存的经济灾难。

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再度引发了产生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但被搁置到2010年的一个关键问题的讨论：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德国的欧洲，还是一个欧洲的德国？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德国政府与民众想要的是一个基于柏林共识的德国的欧洲。这意味着财政赤字将被急剧削减，不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宪章修订，强制推行收支平衡，并且惩罚违规者；欧洲委员会对于各国预算执行情况实施监管；通过修改欧洲相关条约，加快实施财政同盟，把欧元区用德国希望建立的规则捆绑起来，大力下压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强制实施经济紧缩（这正是过去十年间德国恢复自身竞争力的做法）。

问题在于，大多数处于德国压力之下的欧盟国家，已经采取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经济紧缩疗法。他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够多了，可是回归经济增长

* 克劳德·斯马加（Claude Smadja）是瑞士人，2001年至今任斯马加战略咨询公司总裁，1996-2001年任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任，主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及亚洲事务。本文为作者应约为本简报撰写的专稿，原文为英文。



的前景仍然微乎其微。他们不希望再被别人告知：“这样做很痛苦，但却是为了你们自己好。”唯一能够慰藉德国渴望的国家是法国，但是法国自身难保，它只能采取有限的行动来追随德国，如同一个舞者勉强拽住舞伴，恳求对方能够放慢步伐。

德国希望依据自身理念改造欧洲和其他欧洲国家对于这种前景的抗拒这两者之间产生的摩擦，在未来几年内，将成为影响欧洲国家之间讨论的一切重大问题的背景因素。即使人们不得不认为，各方即便仅仅为了寻找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也会让欧元挺过这场危机，可是此后不管关于危机的各种论调提出再多对“更欧洲”的需求，也不必期待欧洲能够强力复兴了。

曾几何时，在欧元诞生十周年的时候，欧洲一体化被誉为可以同泰姬陵和油画《蒙娜丽莎》相媲美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印证了欧洲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世纪之交，多少人在谈论欧洲时代的到来啊！现在可以把它统统抛到脑后了。当下的危机足以令任何将欧洲视为即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单一实体的希望破灭。欧洲委员会主席和外交安全政策最高代表职位的设立，依旧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的花架子。

将目光转向美国，形势同样不容乐观。以美国衰落为基调的思想难以抑制：美国挣扎于衰退之中，无法扭转债务困局，公共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水平下滑；政治体系瘫痪与领导人的无能互相作用，导致任何重大改革都无力推行。奥巴马政府的表现已经让人失望，但是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那样能够成功地高声宣布“早安美国”的新领导人还没有浮出水面。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所面对的第一场危机；过去，美国总是能够从危机中重新站起，并且变得更加强大。然而，现在的美国社会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分化，伴随危机而出现的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前所未有，重压之下的中产阶级举步维艰，所有这些使得把握未来的能力这一美国最重要的品质是否能够保持发扬下去，仍有待观察。无论福兮祸兮，美国的对外军事冒险暂时告一段落，应对严重的国内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军事优势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关键领域，其技术依然领先；而且人们依然能够感触到美国的软实力优势。但是，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时，奥巴马上台执政所体现出的最大意义，甚或是美国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并非他是第一位当选总统的黑人，而是他是第一位面临美国权力受到如此严酷的新的制约的总统。只有信念超强的人，才会看不到美国称雄的时代只属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而不属于今天。

如果欧洲与美国未来的发展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预测的话，中国的情况则最令人困惑。这曾经被视为中国称雄的时代：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并且仍然在大踏步向前。北京对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应对以及管理经济的方式，都让那些不断发出中国无法保持如此快速增长势头的声音的人，显得像无可救药的嫉妒鬼。西方世界对于经济和金融灾难的应对不力，让北京模式为很多国家所羡慕，不管它自身存在怎样的缺陷。

问题在于，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并没有以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它也极力避免在任何国际问题上起带头作用。用一句套话来说，“它没有承担与自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北京态度坚决甚至近于以强凌弱的唯一问题是南海问题。就算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仍然怀疑，中国的态度可能更多的是反映了高层的不安全感，以及内部协调的缺失，而非内在的力量。

事实上，从各方面来看，中国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紧张，如此缺乏安全感：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日益彰显的对于滥用权力、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腐败的反抗，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并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理由，以暴力的形式迸发出来。当政府试图把增长方式由过度依赖大宗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资源开采和出口主导型模式转向低碳、国内消费导向以及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国内挑战出现了。不仅如同日本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战略转型很难实现，而且也让北京和那些我行我素，依旧坚持资源密集型、规模型而非注重效益和节约的发展道路的各省政府形成对立。这种情况在接下来很多年里，将会耗费领导人的大量精力。

是的，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复杂的挑战需要应对和克服，尽管增长速度已经从10%以上下降到8%左右，人们依然可以认为，中国将会继续处于上升期。但现在断定中国称雄的时代已经来临尚为时过早，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这么判断，而且也绝不仅仅是出于谦逊。

在这种背景下，是否有可能出现印度称雄的时代呢？现在是一个更加自信的印度通过展现包容性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抢占道德制高点，倡导一种能够整合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宏图 and 力量，实现共赢的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观念的时候吗？理论上是这样的，如果印度不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如果它大多数



政治阶层不那么自私自利，如果印度政府没有迷失方向，别像看上去那么倦怠，那么无力推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话。2006年提出的“印度无处不在”的宣传口号，已经失去了动力；对于印度称雄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如果现在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称雄的时代，那会不会是多边主义的时代呢？通过审慎的观察，可以再次得出让人头脑清醒的结论。倘若1999年G20的创建被誉为是因为意识到了全球经济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各种核心问题的相互影响而有必要采取的多边手段，那么12年之后，人们却发现，这个集团只是作为一个清谈俱乐部而存在，虽然有用但却没有任何执行力。同时，联合国也因为过时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构成所产生的局限而行动迟缓。多哈回合提出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无力完成，以及不断增加的地区性贸易协定则是在当前环境下多边主义局限性的又一体现。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无论怎么论述现在是多边主义的时代，这听上去都更像是一种想当然，还不能令我们相信。

我们必须接受的基本事实是，2008年的危机标志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终结，或者说得较为温和一点，标志着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威望的终结。新的架构和替代性的领导体系还未出现。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出现的领导真空意味着人们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不管是纠正威胁整个国际经济的宏观经济失衡，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日益增长的世界资源压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除了一些或多或少欠妥的应急措施外，我们依旧没有准备好应对全球性的危机，处理愈发变化无常的全球化世界所产生的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变化无常将是其内在特征。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而且充满风险的时代。

（李晨译，于铁军校）